國家發展研究　第七卷第二期
2008 年 6 月　　頁 29-62

妄身未明？
石原慎太郎的世界觀與「中國」論

莊雅涵*

收稿日期：2007 年 5 月 30 日　　接受日期：2007 年 12 月 15 日

* 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研究生；Email:yahanduken@gmail.com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摘要

石原慎太郎是當代日本民族主義政治家的要角，但他追求「正常國家」的論述仍離不開戰前日本以「中國」為參照點，俾能超越亞洲、與西洋大國平起平坐的問題意識。本文整理石原慎太郎的從政歷程以及他對於美國、中國的各種批評，認為他的國際關係圖式帶有大正昭和年間日本由「脫亞」轉回「興亞」，期望共興亞洲以抗歐美的色彩；但由於當代中國的崛起，使石原慎太郎無法效法戰前右翼收編中國，反而徘徊在歐亞之間，對日本的位置更趨困惑。

關鍵詞：亞洲、亞細亞主義、中國、冷戰、石原慎太郎、日本、正常國家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現任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是當今日本右翼政治家中的代表性人物。1989 年，他以「可以說 No 的日本」在日本暢銷一百萬冊，書中挑戰美國霸權的犀利觀點引起美方震撼，從此贏得「Dr. NO」的諢稱；1999 年 4 月，他以超黨派之姿在東京都知事選舉中獲得壓倒性勝利，使一海之隔的台灣與中國對此結果呈現兩樣情懷[1]；就任以後，毫不遮掩親台反中立場的他頻頻挑動中日台間的敏感神經，各種歧視性的發言[2]和鞏固右翼國家觀的舉措[3]也屢屢招來國內外爭議。2007 年 4 月，在自民黨支持下，石原慎太郎又在東京都知事選舉中獲勝，堂堂邁入他的第三個任期。文學家出身的石原慎太郎不僅是位政治人物，也具有文化影響力，早年他以文學和電影在日本社會掀起旋風，引領大眾文化的流行；步入政壇後他仍寫作不輟，持續在報端發表政治評論，同時也涉足小說、電影編劇，且親自製作有線電視節目《東京男孩》，以荒謬搞笑的形式在節目中談論時政和日本歷史。雖然石原慎太郎只是地方首長，而非掌握日本外交的中央決策者，但向以直言著稱的他在各種議題上皆有鷹派立場鮮明的發言，能幫助研究者清晰掌握日本右翼的歷史認知和國際觀，而其政治生涯中的連戰皆捷，亦顯示其觀點能抓住日本社會的主要矛盾。本文將透過整理石原慎太郎的人生歷程與國際政治觀點，討論日本右翼如何在「歐」「亞」間自我定位。本論文的寫作前提是：近代日本

1 台灣媒體除了強調石原的右派立場之外，皆不忘提及石原「對台灣友好」、「曾允諾邀請李總統訪日」，呼應著李登輝任內積極建構台獨論述基礎、尋求重新詮釋台日關係的氛圍；相較於此，中國大陸對石原的批判卻是不假辭色，稱呼石原為「軍國主義的招魂者」、「中日關係的雜音」等等，還未待到石原正式就任市長，各方便隔著兩國媒體唇槍舌戰。

2 如 2000 年 4 月間在公開場合指東京地區應慎防「非法入境的三國人犯罪」，雖曾發表書面聲明道歉，2003 年 4 月與 2006 年 9 月間仍再次發生類似發言，引起聯合國「人種歧視排除委員會」關注；2001 年 11 月接受雜誌專訪時指「失去生殖能力的女性是無用之物」而遭到婦女團體控告，要求賠償精神損害並登廣告道歉，兩度審判都判原告勝訴；2000 年七八月間則陸續發言指同性戀為「異常」且「落後」，且在東京都促進人權綱領中刪除對於同性戀的保障條款；2004 年又公開指「我不得不說法語沒有資格成為國際性語言，因為它不能數數」而被 21 名在日本的法語教師告上法庭要求賠償。

3 即要求市內公立學校使用「新版歷史教科書」，以及每年參拜靖國神社之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現代化的過程中為了成為符合歐美標準的文明大國，在歐洲與亞洲之間持續轉換與再定義其自我認同，而由於日本歷史上與中國的深刻聯繫，每一次的自我再定義，亦要重新處理「中國」的意義。本文的寫作目的，便是整理石原慎太郎關於美國與中國的言論，從而探討其自他認識與戰前日本退出中國的過程相比，有著哪些「變」與「不變」。

本論文共分為五段：第一段介紹石原慎太郎的身世背景、崛起文壇之路、以及日後從政的轉折；第二段介紹戰後日本從「經濟大國」逐步邁向「政治大國」的道路，和該期間外交政策的挪移；第三段、第四段分別整理石原對於美國與中國的批評，第五段同時也是結論，將為對石原的國際關係觀點提出總評。

壹、「太陽王」的誕生

1932 年 9 月 30 日，石原慎太郎出生於神戶市兵庫縣。他的父親是一名白領階級，在山下輪船公司擔任主管。1937 年，由於父親工作之需，舉家搬遷至北海道的小樽，在那裡石原兄弟度過一段優渥愜意的童年時光，就讀全市最好的私立小學，生活絲毫未受到中日戰爭衝擊。1944 年，石原全家又搬回東京附近的湘南地區，不久，父親在上班時間因心臟病發去逝，家中頓失經濟依靠，身為長男的石原慎太郎毅然挑起家長責任，協助母親度量支出（石原慎太郎，1987：46）；同時，他的弟弟裕次郎加入鎮上幫派，動輒與警衝突，因此慎太郎必須扮演父親的角色，管教弟弟的起居行止（Nathan, 2001）。高中畢業後，石原慎太郎便休學在家，照顧母親與弟弟。

1950 年，在家庭長輩的建議下，石原慎太郎放棄原本心儀的法國文學系，進入一橋大學會計系就讀。大學三年級時，同學邀他投稿《一橋文藝》雜誌，他以弟弟裕次郎及其朋友們放浪不羈的生活為藍圖，創作了第一篇小說〈灰色的教室〉。小說獲得的好評令石原大受鼓舞，乃著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手撰寫中篇小說〈太陽的季節〉參加雜誌《文學界》(《*Bungakkai*》)舉辦的新人獎，隨即得到首獎。故事描寫一群年輕人在親密關係中的迷惑：拳擊手龍哉與少女英子相戀，年青的他無法捉摸心中情感，先與兄長打賭將戀人「讓」給哥哥，與女友修好後卻發現其懷孕，左右為難之下還是要求英子墮胎，卻以手術失敗、英子併發腹膜炎死亡作結；整篇小說圍繞著男主角龍哉迷惘的內心世界，他從未考慮過英子的需求，即使在戀人的喪禮上面對其親人責難時，他心中的獨白只有「這一切你們都不會瞭解的！」

這部作品獲得了《文學界》評審的一致讚賞。在美國甫結束對日佔領，日本「五五年體制[4]」確立的 1955 年，當時成熟作家的作品往往仍無法擺脫戰爭記憶，充斥著大戰夢魘的囈語，而《文學界》獎項的評審群則為〈太陽的季節〉所描摹的年輕人面貌所動容，認為該小說成功地以「『十足的隨意口吻』(utter casualness)傳達了邊緣青少年的憤怒與敗德」，恰恰呼應著世界戰後文學（après guerre）的潮流，表現了新世代面對戰爭創傷的憤怒、迷離、自我放逐(Sherif, 2005：195)。1956 年初，這篇作品又獲得了文學界的大獎《芥川賞》，然此決定隨即引起社會譁然，作家 Nakano Shigeharu 直批此乃玷污芥川獎的悠久傳統與地位，另外還有數位作家亦表示芥川獎不該肯定此種「任性青年的猥褻文學[5]」(謝志宇，Ibid：234)。

---

[4] 1955 年，日本的左、右兩派政治勢力相繼完成整合，並在眾議院大選中囊括 97% 選票，自民黨與社會黨的力量形成 2：1 的對比。這一對抗格局後被稱為「55 年體制」，以保守獨裁的作風主宰日本內政將近四十年，直到 1993 年大選，自民黨失去獨大優勢被迫組成聯合內閣，55 年體制才告崩解。「55 年體制」所彰顯的不僅是「護憲、去武裝」／「修憲、重新武裝」之間的意識型態對立，在冷戰國際格局的牽動下，兩股勢力的互動也一再生產出新的衝突，以及對日本民主發展和國家定位的歧異理解。歷史學家 John Dower 便認為，1951 年舊金山和會的締盟與 1955 年體制的成形，是決定戰後日本政治發展的兩層結構，而其間存在的張力在往後日本政治中便呈現為「民主」與「和平」兩種價值目標的衝突。更細緻的分析詳見 John Dower, “Peace and Democracy in Two Systems”, in Dower, John (ed). 1993, “Postwar Japan as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3-33.

[5] 其實小說中並沒有大量性愛場面，而多以明快筆法推進人物的互動，但幾乎所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儘管今日看來這篇小說彷彿只是平凡無奇的言情故事，但在 1955 年的東京，當年方二十的石原慎太郎以親身經驗作為為書寫題材，已預示著日本告別戰敗蕭條後嶄新時代旋律的端倪。在 2001 年東京幻冬舍重新出版〈太陽的季節〉等四篇小說合輯時，石原慎太郎透過〈後記〉回憶寫作當時的心情：

> 當時正值日本社會從戰敗後的荒蕪重新復甦之際，好不容易正要迎接消費時代的來臨，也就是正值一個未曾出現過的文明逐漸到來的時代。由於之前戰爭以及戰後的荒廢狀況已漸漸消失，對眾人自由的壓抑不再，每個人都想竭盡所能地在人生當中展現出自己的情慾，希望能脫去壓抑本能的枷鎖，以從中獲得心理補償的生活。……總而言之，我的青春就如同收錄在此的作品一般。直至今日，我仍保持著往常的心情，絲毫不覺得障礙或恥辱。
>
> （2004：364）

對上一代教育與大傳統的反叛及懷疑，是戰後崛起作家普遍的心理。比石原小兩歲的大江健三郎，就對大人們在戰敗時丕變的說法感到荒謬－「直到盛夏之前，老師們原本說著天皇是『神』，要我們朝著相片膜拜，還說美國人不是人，是鬼、是野獸；突然間他們毫不在意地說著完全相反的事情，完全不提之前的想法、教法錯了，需要反省，祇是非常自然地改口說，我們天皇也是人，而美國人則是朋友。」因此「戰爭結束之後，我就不上學了。」（2002：2f）思及戰敗當下的感受，石原也有著類似的反應：「戰爭中，他們教育我們，為天皇而死是光榮的；

關於本作品的評論，皆不忘引用主角初次發生性關係前，男主角「以勃起的陰莖戳破紙窗」（石原慎太郎，2004：38）的文字，而這一畫面也就為這部作品種下爭議形象。時至今日，或可判斷石原的快意描寫並非偶然，其小說中一個又一個血氣方剛的男主角，乃至對父親威嚴的歌詠，男子氣概的凸出是石原好強調的特徵之一；加以其多次以閹割之於男性譬喻憲法第九條之於日本，在在披露了石原在「國家」、「男性氣概」與「自我實現」之間所安放的連結。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可接下來我所知道的全是懺悔、民主、和美國相處等等。大人們顯得既膚淺又虛偽。」（Nathan, 2001）這些態度明顯不同於在戰前便成年的林房雄、三島由紀夫等人[6]。對石原所屬的世代而言，比起家國、傳統崩潰的憂懼，更切身的困惑是如何在價值系統一瞬改朝換代的文化真空中，覓得安身之路標。壯年後的大江成為日本新左翼健將，以普遍性的人道主義話語持續思索戰爭反省與和平締建；而缺乏戰爭創傷體驗的石原則轉向對自我感受、信念的探索與肯定。因此他擁抱熱烈的情感與都市消費體驗中流竄的欲望，並對「大人們」緬懷的傳統嗤之以鼻。

在〈太陽的季節〉中，他是如此刻劃老一輩的迂腐與年青世代的徬徨：

> 如果大人們不要毀壞自己所創造的世界並且能夠重視晚輩的話，那麼他們不得不害怕的便絕非是共產黨。事實上，他們也不害怕。他們在這枯竭的土地上，不知不覺地用自己的雙手孕育了新的情操與道德，並培養出創新的人類，就像在沙漠中的仙人掌，雖然乾渴卻仍得意洋洋地開著花，那些在乾燥地面上綻放的花兒們，並不覺得自己的土壤是乾枯的，這實在是很可悲。
>
> 旁人用來責難的那一套標準，事實上他們相當憎惡，因此在潛意識中更試圖去破壞它。大人們認為已經廣闊開展的世界，事實上反而變得狹隘，他們要求更開放活潑的世界，但最先把人類的情感當作物品來衡量的，究竟是誰呢？
>
> （2004：33-34）

從這段文字裡，不只可以讀出跨時代青年共享的叛逆性，也蘊含著1950年代日本社會在冷戰結構下的「美國」體驗。社會學者吉見俊哉指

[6] 以比石原慎太郎年長七歲的三島由紀夫為例，戰敗時正滿二十歲的他，感受到與傳統被割離的憂惶：「戰爭結束了，當我聽到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時，心中唯一想到的只有金閣寺。金閣寺與我之間的關連被切斷了，我想現在我要回去，回到一種美在一端、我在另一端的狀況。」（Nathan, 1988：6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出，戰後日本對於「美國」的認識是建立在「基地」與「消費文化」間的二重對立上，前者象徵軍事與政治的支配狀態，而後者是經濟與文化的慾望對象，二種權力的互動便形構了日本面對美國愛憎交織的自他認識，一面要抗拒作為軍事霸權的美國，一面卻無法抵擋美國文化與生活方式的入侵[7]。〈太陽的季節〉主角正是邂逅於二戰後美軍佔領設施的銀座地區（Ibid：77）。因此，石原所謂「雖然乾渴卻仍得意洋洋地開著花」的意象，何嘗不是戰後日本青年獨有的困惑：他們既要承受敗戰衝擊下傳統被瞬間抽乾的集體空白，又迅即被推入消費文化生產的誘惑中，追隨高速經濟成長所勾勒的慾望法則。石原慎太郎看見了時代的轉向，於是透過小說人物的暴力、憤怒、自我中心來呈現其所屬世代的徬徨，而隨後所吸引的廣大迴響，也印證了此一心理的需要。

在褒貶兩極的評價中，石原慎太郎與弟弟迅速崛起為大眾文化的明星。〈太陽的季節〉在出版一年內暢銷近三十萬冊，創下戰後小說的紀錄；1956 年，〈太陽的季節〉改編成電影，兩兄弟皆參與演出，該片立即在年輕人間掀起旋風，影迷們一窩蜂模仿片中人物穿起夏威夷衫、寬大的褲子，以「太陽族」自居；隔年再推出石原慎太郎撰寫劇本、裕次郎擔綱演出的續集電影「瘋狂的果實」，裕次郎就此成為超級明星，兩兄弟也陸續又合作了十幾部電影作品，將石原裕次郎打造為 James Dean 一般的叛逆英雄，石原兄弟頓成一代憤怒青年的偶像[8]。

---

[7] 根據吉見俊哉的看法，這兩種「美國」的意象並非對立關係。作為軍事強權的美國符號與暴力、帝國勾連在一起，是日本從上到下都亟欲抵抗的，但作為經濟文化領導象徵－易言之，作為現代性表徵－的美國，則迅速填補了戰後日本集體認同的真空。兩種「美國性」的脫鉤，於是也為日本創造了內在的他者，使得各種欲確立「日本特性」的政治論述必須往斷裂而遙遠的傳統求索，卻更顯虛無而緣木求魚。

[8] 值得注意的是，石原的優渥身世使他成為特定生活經驗的傳播者。他在訪談中提及：「當時除了東京以外，日本其他地方都落後地令人難以置信。大多數孩子都沒見過遊艇、滑水和摩托車，當然更沒有像我們那樣和女孩子在一起。我們買了作女孩子裙子的、顏色鮮豔的花紋布，讓裕次郎的一個女友縫成襯衫，所有人都迷上了。年青人竟然這麼盲目，讓我覺得驚訝。」在戰後積極重建、發展不均的日本，東京仍是文化朝聖的中心，足見單以世代的憤怒情緒不足解釋〈太陽的季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966 年年底越戰方酣之際，石原慎太郎接受《讀賣新聞》雜誌社委託，前往越南採訪。在此之前他已是全日本稿酬最高的名作家，大量創作小說、劇本，並曾環遊世界，過著奔放的名流生活。而同一期間的日本則處在國內與國際政治的緊密糾結中，國際冷戰結構體現為國內的「保革對峙」：在美國強加的「民主－和平」體制下，國內左右兩派勢力間在「護憲－和平主義」和「修憲－重新武裝」戰線上相持不下，右派批評憲法第九條的和平條款致使日本國家主權跛腳，亟欲脫離從屬位，修憲確立日美平等的「夥伴關係」；而左派則批判美國勢力在東亞的擴張，並欲維護和平憲法，唯恐再次捲入戰爭。此衝突在 1960 年的反安保續約運動中到達最高點。當時，石原認為續約是正確選擇，惟反對國會不顧民意強行通過的作法，故夥同文評家江藤淳成立「有朝氣的日本之會」，推動國會的民主化；在輿論沸騰中，他也為文反對群眾因「盲目反美」而反對安保續約，鼓吹揚棄「絕對主義與粗糙的二元對立論」，並評論抗爭中死於劇烈衝突的東大女學生樺美智子為「自己踏死自己的女學生」（石原慎太郎，2006：15）；目睹國內的反戰潮浪，他更對所謂進步知識份子語帶奚落，認為其只是出於下意識地反美因而愚蠢地投向共產主義陣營（Ibid：8）。

在越南的採訪經驗令石原慎太郎感到震撼。「那種自暴自棄似的對於自己明天的命運的冷笑和不關心，我好像在這裡見到了和我的祖國日本的強烈類似之處。」（Ibid：14）回國後目睹知識界瀰漫的同情中國風氣[9]，以及勃發的反資本主義運動[10]，都激發著石原入仕之念；適逢自民

[9] 節〉的走紅，在物質層次所提供的新鮮感與異國情調，亦扮演推波助瀾之力量。由於知識界反美的心態和對於侵略中國的愧疚心態，戰後的日本學院由馬克思主義佔據了政治正確性，可參見孫歌，2007，〈在大陸語境中翻譯竹內好——進出政治正確的中國論述〉。

[10] 包括：尋求戰爭賠償的「戰爭受害者運動」、抗議環境傷害的環境保護運動、要求合理住屋分配的「住民運動」、抗議不當勞動條件的工人運動、以及反戰意識下激越的大學生罷課潮，都在六零年代的尾聲高分貝挑戰著自民黨執政的正當性。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黨因應鄉村人口結構的變革，有意招徠形象突出的知識份子入黨，石原慎太郎於是投入參議院選舉，並在巨星弟弟的拉抬下以創紀錄高票當選，四年後競選眾議員，同樣順利當選，就此連任八次。1995 年，因不滿自民黨的腐敗與官僚主義，他曾短暫退出政壇，旋即於 1998 年重返政界投入東京都知事選舉，一路連任至今。

貳、從退出中國到中國威脅論：日本的大國路

自明治維新以降，日本的自我認同便緊扣著如何在歐洲與亞洲之間安放自我的困惑。1885 年福澤諭吉的「脫亞論[11]」開啟日本超越亞洲，擺脫「他者」落後形象的意識，藉器物革新與亞洲鄰國割袍斷義，而戮力成為與歐美平起平坐的「文明」國家。直到戰後這條思維仍由丸山真男所繼承。除了在知識上效法西方史學，學習從歐美的眼睛來看待亞洲他國[12]，並且從各種角度與有著深刻歷史聯繫的中國進行區隔[13]，在外交戰略部分，日本政府則模仿西洋各國的行徑，試圖依樣畫葫蘆的依循現實主義邏輯，擺出一切以擴張國家利益為指導原則的西洋國家姿態。經歷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勝利，並成功佔領台灣、朝鮮後，日本已被捲入列強的侵略競賽中，不再有與中國為友朋的餘地；1915 年對中國提出「21 條要求」，象徵日本政府選擇將自己擺在西方侵略者的立場，正式與中

[11] 又名「惡鄰論」:「現今的中國朝鮮對我日本不僅未有絲毫幫助，而且因三國地理相連，在西方人眼中，間或同一視之，或以評價中韓的標準來看日本……為今日計，我國沒有餘裕等待鄰國的開明以共興亞細亞，而應該不與其為伍，與西方文明諸國共進退。」轉引自山室信一：2005。

[12] 這裡指的是東京學派白鳥庫吉建立「東洋史學」，使日本取得超越亞洲的客觀主體位置，進而與歐美平起平坐的作法。可參見 Steven Tanaka, Japan's Orient: Rendering Past into History.

[13] 可參考子安宣邦，2001，〈巨大的他者—近代日本的中國像〉，收錄於子安宣邦，2004，《東亞論－日本現代思想批判》，趙京華譯，長春：吉林人民；或石之瑜等，2007，〈日本近代中國學：知識可否解放身份〉，中國社會科學學院院刊 163 期，pp.168-17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國為敵（Ibid：220）；但由於「進入西方」的不順遂[14]，又遭逢國內不景氣和龐大的發展壓力，表面一律採取現實主義的日本，也能認識到現實主義解決不了身分問題，遂又將焦點轉回亞洲，提出了「大東亞共榮」主張，以「解放亞洲」之名，儼然東亞一體，進而在東亞各地遂行亞洲各國眼中的殖民佔領與經濟剝削[15]。

這番學習修養的過程終竟以二次大戰戰敗的屈辱告終。戰後日本在冷戰格局下被劃入美國圍堵線中，順理成章地成為「西方」所管轄，其生活方式與價值也全面向美國傾斜。1961 年，在安保運動帶來的社會緊張中，池田內閣提出了「所得倍增政策」轉移政治對立的焦點，果真締造了傲人的經濟成長[16]，而此成就更在日本國內外俱形成深遠影響：在國內方面，高速經濟成長使得公民社會運動漸趨瓦解，60 年代激越的反美、反資本主義擴張意志已無以為繼，取而代之的是中產階級壯大後的個人主義抬頭與政治冷漠（Asada, 2000：20f）。在國際層次，此一受到西方在內各界公認的成就，大大提高日本之聲望，為日本加強與東南亞各國的經貿交往築就利基，包括馬來西亞、新加坡、寮國陸續以「向日本學習（Learn From Japan）」為口號推動經濟發展計畫，強化與日本的經濟關係（Singh, 2002：285），「雁行理論」應運而生，相信日本能夠引領著亞洲諸國共同發展經濟；美國學者 Ezra Vogel 甚至寫作《日本第一》一書，以日本的發展經驗質疑美國模式的未來。同時，日本逐漸增加對外官方發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的經費，到 1980

[14] 要者如甲午戰爭之後俄、德、法三國干涉還遼，以及 1920 年代美國國內的反移民排日運動，都提醒著日本受到西方完全接納的不可能，於是將眼光轉回亞洲。

[15] 因此日本對於亞洲由「脫亞」而「興亞」再至於「侵亞」的政策轉變，實深受其歐化工程的成敗所牽動：日本愈是受到西方排擠，就愈需要強化其於亞洲的歸屬感，好帶著「亞洲第一」的身份來領導亞洲抗衡西方；然由於渴望成為文明大國的「優等生意識」不熄，日本面對亞洲鄰國時便只能複製歐美帝國主義的富國強兵邏輯，渴望歐美的承認，因此無時無刻又存在一種以排除中國來取得西洋身分的誘惑，「亞洲第一」反而變得不相關。因此這並非真是所謂現實主義。

[16] 1961 年池田內閣提出「所得倍增政策」後，日本締造驚人的高速經濟成長。1964 年，日本加入 OECD，1968 年 GNP 躍為世界排名第二位，到了石油危機爆發的 1973 年，全國 GNP 已較 1955 年增加了 5.4 倍。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年代不但躍為世界第二大 ODA 輸出國，在亞太地區投入的經費甚至超越美國，成為 ODA 輸出最高額的國家[17]（Grant & Nijman, 1997：42）。

更重要的是，經濟成就讓知識界重新瞥見了日本重登「大國」之林的曙光。由於日本政府深明其外交動作的敏感性[18]，因此早已承諾全力發展「經濟大國」角色，並「保證不成為軍事大國」[19]。然而，這一路線在 80 年代中曾根內閣上任後發生質變：1982 年 12 月，甫上任的中曾根康弘在自民黨內演講時喊出「戰後政治總決算」的口號，要使日本的國際政治、外交地位與經濟地位並駕齊驅[20]，日本欲走向「政治大國」的目標已昭然若揭。然而此時中曾根康弘以「立足日美同盟、貢獻國際」作為口號，並在訪問美國時鼓勵其「將日本建設成一艘『不沈的航空母艦』，落實日美同盟關係，共同抗蘇」（孫政，2005：232），顯見此時日本的自我認知是要作一個與美國並駕齊驅的政治大國。所謂的「戰後政治總決算」，所意味即是從 1945 年來日本全心全意向美國學習、欲化成文明「大國」之目標終完成階段性任務，只等著普世文明的「師傅」對其點頭，肯定日本就此躋身「進步大國」之列。

但冷戰的瓦解又將日本的發展帶入新處境。首先是「日美安保條約」的合理性面臨問號，要不要繼續作美國的戰略夥伴？另一方面，日本又要如何處理與亞洲的關連？此時從日本商界到大眾傳媒皆吹起「脫美入亞」的口號（卓南生，2006：467-472），彷彿重蹈著戰前由「脫亞」轉

[17] 學者們認為日本積極輸出 ODA 的理由，不外乎此舉有助提升自民黨政府在國內外的聲望，同時也提供日本一個更趨開朗、具有國際參與實力的未來圖像，彰顯日本符應西方現代大國標準的實力（Yasumoto, 1989）。然而卓南生也指出，此舉對於提升日本國際形象助益有限，東南亞國家仍慣常感覺日本的經援政策是精打細算的「支票本政策」。

[18] 1974 年首相田中角榮訪問東南亞，在泰國曼谷、印尼雅加達皆遭遇激烈示威，顯示東南亞各國對於日本在戰爭期間的暴行仍有憤怒。

[19] 即著名的「福田主義」，由首相福田赳夫 1977 年 8 月 18 訪問菲律賓時在演說中發表。

[20] 中曾根的政治改革包括三個方面：1.財政改革，內涵為放鬆政府管制，擴大國營事業民營化；2.教育改革，具體內容為加強愛國教育，改變歷史意識；3.外交政策改革，具體措施即增加防衛經費，突破戰後「禁區」，進而能夠作為「西方一員」以貢獻國際。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回「興亞」的軌跡，但曾經睥睨世界經濟的日本卻在 90 年代初期陷入泡沫經濟危機，而一百年前慘遭列強瓜分的中國卻逐漸擺脫弱者姿態，而儼然有超越日本成為區域新霸權之勢，這是一個日本所陌生的中國，也是不可能憑藉「大東亞共榮圈」名義將其收編的中國。因此不同於戰前興亞論者將中國視為己身之一部份，尋求共同朝普遍性邁進的態度，戰後日本在「重返亞洲」的同時也流行起「中國威脅論[21]」，將中國視為日本在區域的勁敵。

正是在此氛圍下，石原發表了一系列「日本可以說 No」的主張。在自民黨內繼承中曾根康弘「保守本流」路線的他，國際關係觀點也與日本的國家主義相互纏繞。以下就詳述其對美國與中國的看法，以釐清其國家主義思考與二戰前右翼觀點的聯繫。

參、石原慎太郎對於美國的批評

從 1989 年至 1995 年之間，石原慎太郎陸續出版了四本政治評論集《可以說 No 的日本》（與新力總裁盛田昭夫合著）、《即使這樣也敢說 No 的日本》（與上智大學教授渡部昇一、軍事評論家小川和久合著）、《日本堅決說 No》（與文藝評論家江藤淳合著）、《亞洲也可以說 No》（與馬來西亞總理馬哈地合著），這一系列作品圍繞著清晰不變的主軸：日本要在外交上擺脫「沈默是金」的服從性，挺身拒絕來自美國的不合理要求。提綱挈領，他對於美國的挑戰包含以下三個面向：

[21] 發軔於日本防衛大學村井友秀 1990 年發表於《諸君》的文章，以「論中國這個潛在威脅」為題，從軍事實力與綜合國力著眼，指出中國正在重建部隊積極尋求重新成為「霸主」的機會，對於正在走向政治大國之路的日本是個潛在的大威脅。此文引起日本社會極大迴響震撼，一時湧現畏懼中國現代化、「要讓中國永遠在技術上落後日本十至十五年」的聲音，也使日本政府重新檢討對中國政策轉向保守。詳見何思慎，2001，「『中國威脅論』與二十一世紀日本對中國政策芻義——以經濟與軍事為中心」http://www.koryu.or.jp/08_03_03_01_middle.nsf/1384a27fc6686a1a49256798000a62f6/274073eeb7d0a1ef49256ab00025bea4/$FILE/hoszushen.pdf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美國對日本懷有種族歧視，使日本屈居從屬地位

從 1980 年代起，日美之間便為了美日間年年成長的貿易逆差頻生齟齬，美國責怪日本不肯開放市場，透過貿易制裁要脅日本促進貿易平衡，兩國在 1986 年的關貿總協烏拉圭回合談判中，更為了農產品補貼等關鍵議題爭執不休；加以日本企業在美國社會中的存在日益明顯，一股「日本威脅論」在美國社會中蔓延，主張重新評價美日同盟為美國所創造的利益（查道炯，2003）。石原慎太郎批評此種心理完全出自種族歧視，使美國不願承認日本在貿易與技術研發上的創意，不珍惜日本對兩國同盟關係的貢獻，而以蠻橫的手段對日本予取予求（石原慎太郎，2006：499）。石原認為，貿易摩擦僅僅是美國對日偏見的例子之一[22]，從軍事分工到在日美安保條約中的形象，石原都為日本抱不平。

我追問：「美國的核子潛艇數目不及蘇聯，因此常受到壓力。為什麼不能讓日本分憂，如果是德國或英國的商船，是否就另當別論？」對方率直地回答說：「如果是他們就可以。」

簡而言之，他們率直地認為：日本是個不能信任的國家。……委託日本做這種情蒐工作反而令人擔心害怕，或許委託蘇聯人還比較好呢！我想我們必須覺悟，因為他們內心的種族歧視非常根深蒂固。（1990：37-38）

石原也抨擊美國輕視日本在美日安保條約中的付出。「美國積累戰術和戰略經驗所設計出來的軟體，如果沒有日本的半導體晶片，即使輸入電腦也不會運轉。由於日本的技術，使美國減少波斯灣戰爭中的犧牲，無知的美國政治家們說甚麼『日本人沒有流血』，真是太不講理。……日本的技術對美國的軍事力量起著多麼重要的作用，五角大廈再清楚不

[22] 石原也曾分別指出美國對日本丟擲原子彈（1990：38），以及首相田中角榮的洛克希德醜聞（1995：64），都是美國對日種族歧視的例子。而 1990 年應該書英譯版發行前往美國宣傳時，石原也在電視節目中直接抨擊美國國內種族歧視的氾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過了。」（1992：71）因此，他主張日本應重估日美關係，「日本人不會被他們的軍事威力嚇得發抖，也絕不會再對『日本的貢獻不夠』等無端指責保持沈默。……如果美國人作不到這些，今後的美日關係將難以確定。」（Ibid：73）。

二、日本人應發展出新的自我意識，勇敢參與國際事務

為了挑戰美國在外交關係中的強硬姿態，石原鼓吹日本要懂得善用手中的王牌——高科技技術，「在能說『No』時就說『No』」（1990：115）以能與美國平起平坐；而更根本的是日本自我意識的改革：

> 戰後日本一直處於異國文化——美國文化統治之下。從言論限制到憲法，美國在促使與西歐不同的深具特殊性的異己——日本解體。……美國對日政治戰略的核心，就是強加給日本一部帶有令世人吃驚的英文註釋的憲法……，現行憲法限制了日本人的國際意識，不正當地損害了日本的國際地位。正是這部憲法使日本這個國家就像個中國古代的太監，只有陰莖而無睾丸。……
>
> ……日本人有個缺點，就是過多地做自我批評，這也可以說是由地勢條件造成的。總是看他人臉色行事，處處都要使他人如意，這樣做是非常被動的。……然而，現在我們國家已經到了應該發揮男子漢作用的時代了。日本在二次大戰後一直追隨著美國，這種日本有史以來最女性化的被動的生存方式應當結束了。
>
> （1992：92-95）

石原寫作這段文字的用意，除了抽象地要求日本人能發展獨立意識，不再唯美國馬首是瞻外，亦具體呼應了 90 年代初日本國內對於自衛隊是否出兵海外的辯論。雖然修憲與否是從戰後便縈繞著日本政治的老議題，但歷經 70 年代的經濟成長和 80 年代的中曾根主義洗禮，日本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追求成為「正常國家」的意識與合理性已不同於戰後時空下的頹喪，加以蘇聯垮台後東亞地區軍事秩序重新洗牌，日本也趁機摸索在國際事務中的新角色。1990 年自衛隊出兵參與聯合國在柬埔寨的維和行動，首相海部俊樹提出《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法案》為自衛隊出兵建立法源；8 月波斯灣戰爭爆發，總理也提出「中東貢獻論」，意圖追隨美國腳步參與中東安全事務，隔年 4 月更派遣自衛隊海上掃雷艦出航。這一主張也在 1993 年小澤一郎出版的《日本改造計畫》中得到呼應，不同的是當其他政治家仍在「強化日美同盟、伙伴關係」的底線上發言時，石原已將憲法第九條視為美國所強加的束縛，必須加以掙脫，日本才能走自己的路。

三、西方文明已沒落，日本要引領全亞洲發展，抗拒偽善警察國家美國插手

除了批評美國對於日本的輕視，在 1995 年與印尼總理馬哈地合著的《亞洲也可以說 No》中，石原慎太郎進一步將美國所代表的西方文明相對化，從而預言亞洲的崛起：「亞洲必須向美國的單邊主義說『No』。我相信亞洲的其他國家寄望日本能大聲說話，並且亮出手中的王牌。作為這個地區最強大的國家，日本必須作為楷模，與華盛頓平等對談。」（1995：58-65）

石原抨擊美國是偽善的警察國家，不顧國內的種族歧視盛行、犯罪率高升、貧富差距，而以人權警察之姿四處干預（Ibid：99f），其下的驅力則是以一神論為基礎的基督教，使西方擴張主義徹底缺乏容忍精神（Ibid：93）。反之，亞洲的文化是以容忍、尊重多元為基礎，而且強調「和諧」，要求小我與大我相互配合，亞洲的世紀必將是和平共存的時代（Ibid：93-95）。

更重要的是，這個亞洲的世紀將由日本所引導，共抗歐美：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超過一世紀以來日本一直勤奮地吸收西方文明，如此專注一意而幾乎遺忘了我們也是亞洲的一份子。我們是歐美的好學生，也在某些領域表現特出，但在心底我們還是非常貼近亞洲。文化的相互模仿是歷史進步的驅力……就像亞洲人曾經受到西方現代主義啟發，歐洲與北美將再次地向東方學習智慧。
>
> （Ibid：89-92）

綜合以上三點，從石原慎太郎對於美國的批評中，他欲證明的是：日本不但經濟實力足以與歐美並駕齊驅，成為現代化的好學生，相較於言行不一的美國，日本甚至更具有普遍性，更有資格帶著殊異於西方文化價值的亞洲來稱霸世界。然而，在石原期期扛起亞洲抗衡歐美的同時，隔鄰的中國已不再是百年前的東亞病夫，而以蓄勢待發之姿與日本競逐著亞太地區的領導權，因此單是挑戰西方尚不足以證成日本的文明大國地位，更要對崛起中的中國有所評價。以下就進入石原對於中國的評論，以完整其國族敘事的兩面。

肆、永遠的「惡鄰」—石原慎太郎眼中的中國

儘管是偵測並緊緊依隨著美國的腳步，日本早在 1972 年就趕在美國之先與中國關係正常化，之後便與中國建立密切經貿關係。1980 年代中曾根內閣上台後，其政治大國主義為兩國外交製造許多摩擦，包括戰爭責任問題、二次大戰歷史認定問題、主權與領土問題、台灣問題等，都成為兩國關係中的地雷區。政治上的溝通差距與經濟的熱絡來往，為兩國政治關係營造了高度張力。而在這些議題上，石原都曾提出鷹派立場鮮明的發言或政治行動。以下根據發言時序與議題，一一列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青嵐會時期堅決反共

由於不滿田中角榮首相與中共建交，1973 年石原即刻邀集了參眾兩院三十一位議員組成政團「青嵐會」，提出六大宗旨：一、維持自由社會，堅持外交應與自由主義國家群保持緊密聯繫。二、發揚國民道義，改革物質主義，應斷然進行教育正常化。三、照拂弱勢者，建立社會正義，排除富豪之不勞所得。四、為建設和平國家，在和平須來自自衛的前提下，向國民訴求國防與治安之必要性。五、為其在新的歷史中日本民族的真正自由、安全與繁榮，制度自主獨立的憲法。六、黨的運作應打破安逸的妥協、官僚化與機會主義化等弊習（Ibid：199）。

在對外說明青嵐會成立緣由以及血盟的意義時，石原慎太郎以「神風特攻隊」自比，指出必要時將拿出忘我精神，為國家犧牲；另一位成員渡邊美智雄更直指其首要敵人便是共產主義－「青嵐會必須與共產主義決一死戰，否則自民黨終將趨向滅亡」（聯合報，1973a）。青嵐會一成立，便組團前往台灣訪問（聯合報，1973b），以與同時訪問北韓的自民黨議員團互別苗頭；此外也與台灣在日推動對日外交的關係組織「日華議員懇談會」往來密切，定期聚會。而該組織成立未久，適逢內閣正與中國開始研議「日中航權協定」，安排兩國互惠開放領空。青嵐會對此議案極力杯葛，在國會中以扔煙灰缸、掀桌等動作暴力抗議，輿論界頓時將青嵐會與 30 年代發動「二二六事件」、「五一五事件」的極右派青年政治社團相提並論（卓南生，2006：14f）。

二、關於二次大戰的認知

二次大戰戰敗作為現代日本國族主義發展的創傷之核，向來驅使著日本極右派知識份子對之爭辯、抹寫、重新定義。1963 年林房雄發表《大東亞戰爭肯定論》，將黑船事件至二戰之間的日本政治發展史定調為反擊歐美帝國殖民的努力，日本併吞韓國、殖民東南亞因此皆是抵抗侵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過程中的必要之惡；此種認識為立場接近的知識份子所繼承、發展，鼓舞了各種從現代化史觀和反殖民立場為二戰翻案的論述。1980 年代起，隨著經濟成長帶來的民族自信高漲，檢討「大東亞戰爭」評價的意識也從知識界吹到了政壇中。在朝有中曾根首相的一連串教育改革爭議[23]和「藤尾妄言事件[24]」，中曾根康弘更開先例成為戰後首位參拜靖國神社者的首相；在野則有一連串右翼運動在林房雄等人的思考基礎上重新考察、詮釋戰爭歷史，拒絕將日本斷然描繪為劊子手或侵略者的「自虐史觀」[25]。在這股重新評價二戰責任的潮流中，石原慎太郎的發言也不讓曾為青嵐會同志的藤尾正行專美於前。1990 年，在接受美國雜誌「花花公子」專訪時，石原表示「南京屠殺是中國人捏造出來的謊言」，此言一出立刻引起國際輿論反彈，不但中國政府提出抗議，在美的華裔歷史學者亦發表聯名公開信，舉證反駁石原（陳世昌，1990）。

當選東京都知事後，石原又施壓東京市內的中小學應採用「新版歷史教科書」，並強制市內公立殘障學校首先使用該版本的教材，此舉也引起民間反戰派強烈抗議，「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甚至遭人縱火（田思宜，2001）。另外，自從 2000 年 8 月 15 日首次參拜靖國神社之後，石原也年年都在戰敗紀念日率領右翼團體前往，每一次都引起反戰人士與右翼支持者的劇烈衝突（董更生，2001）；2004 年 8 月，他發表給天

[23] 中曾根內閣的教育改革乃是以「激發愛國情操、消弭個人主義」為宗旨，表現於施政卻形成對教科書的修改和二戰歷史評價的重估。1982 年文部省介入中小學教科書的用語，要求將有關日本對外「侵略」的描述一律改為「進出」或「侵入」，「佔領」改為「派遣」，對天皇一律使用敬語，刪除南京大屠殺一節，改寫為「引起中國人劇烈反抗，日軍亦死傷可觀」等，凡此種種皆引起中國、韓國紛紛抗議（孫政，2005：225）。

[24] 曾為青嵐會一員的文部大臣藤尾正行又在 1986 年 7 月 25 日的記者招待會上公然發表否定東京審判、否認侵略歷史，他表示：「有的是對方國家認可的了」，暗指當年日本對於朝鮮的併吞乃是當時朝鮮政權所認可，而非侵略（Ibid：241）；8 月 6 日，又說「不認為東京審判是正當的。」

[25] 自 1970 年代起，對於「南京大屠殺」真相的尋求也在日本知識界造成對立，70 年代的鈴木明、山本七平等人，再至於 80 年代之後的田中正明、渡邊昇一等學者或媒體人紛紛從各種角度否定南京大屠殺的真實性，與以本多勝一、家永三郎等人為代表的「南京大屠殺肯定論」者形成尖銳對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皇的公開信，呼籲天皇參拜靖國神社，作為一國元首的天皇若能帶頭參拜靖國神社，可激發日本人的愛國心，整頓士氣，更可讓鄰國拿日本沒辦法。」2006 年，石原更以「神風特攻隊」為題材撰寫電影劇本，取名「我為你赴死」，消息一出更是引起中韓兩國矚目與反感，深恐本片傳達的史觀再次浪漫化日本侵略歷史、煽動民族主義（黃菁菁，2007）。

歸納石原慎太郎一路以來關於日本在二戰中功過評價的發言，不管是南京大屠殺懷疑論、要求採用「反自虐史觀」教科書、或是歌頌為國捐軀者，核心認識無非為「日本也是西方侵略下的受害者」。1990 年接受花花公子訪問時，在脫口而出「南京大屠殺虛構論」之前，他所欲談論的其實是日本的原爆災難經驗：

問：在你的書中[26]，為了證明美國對日本有種族歧視，你引用美國在大戰時對日本使用原子彈，而非對德國人。但當德國人宣布投降時還沒有原子彈……。

答：我祇是把幾乎所有人心裡的話大聲地說出來罷了，這是我們大多數人的真正感受：也許這會讓你們美國人聽起來不舒服。

問：但這並非事實。

答：一般而言，美國人並不知道原子彈炸死多少人，也不曉得死於核戰後遺症的人有多少，每次提到這點，美國人就會反過來說「日本人攻擊珍珠港」。

問：難道日本的過去作為就不殘酷嗎？中日戰爭期間所發生難以置信的大屠殺，你又怎麼說？

答：手槍機槍怎麼能和原子武器相提並論？它們不是一回事。我們日本人作了甚麼？在哪裡發生過大屠殺？

問：只舉一個例子，1937 年的南京大屠殺，十萬以上的中國百姓被殺。

[26] 指當時正要發表英譯版，然盜版已經隨著美國五角大廈翻譯而流傳的《可以說 No 的日本》（A Japan That Can Say No）一書。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答：人們都說日本幹下大屠殺，但這並不正確。這是中國人編出來的謊言；一直要污辱日本的形象。但這是騙人的謊言。

這段訪談的推進中，可以發現日本右翼談論二戰經驗的典型論法：一方面「虛幻化」南京大屠殺的死傷數字甚或真實性，一方面控訴美國加諸於日本土壤上的傷害；前者是大東亞共榮圈面對西方在其內部進行的自我砥勵與自我犧牲，後者是由日本單獨承擔大東亞共榮圈之後的責任負擔。這種態度在另一篇文章中更清楚地呈現：「我不是完全否定大屠殺的事實，我祇是說從許多權威資料來看，很希望把受難者的具體數字改為二萬六七千人這個準確數字，或進行重新調查。哪怕是這個數字的十分之一還是百分之一，肆意殺人終究是不人道的，屠殺就是屠殺，但是 30 萬人這個天文數字則完全是虛構。在美國，有人公開胡說八道，說甚麼『日本人在中國殺了 30 萬人，挨兩顆原子彈是罪有應得。』美國人至今不知道兩顆原子彈究竟使多少日本人死於非命。」（1992：47-48）石原一面對中國說「不是要否認屠殺，但中國真的沒有死這麼多人」，另一面提醒美國「日本為了大東亞戰爭犧牲了更多人」，這裡是以受害者姿態卸責，不願正面面對中國，擔負起加害者的責任；而在詮釋侵略歷史時，石原採取了「自衛論」——「由於在歐洲近代主義的原理只有一項，那是要搶奪殖民地，或被搶奪為殖民地的二選一的帝國主義之力學而已。日本就在目睹發生於亞洲的鄰近各國被歐洲列強殖民地化的慘況，為了避免日本也被殖民地化，戰勝清國、俄國，而擠進列強之一。但是日本也誤入帝國主義這一當時的歷史原理，官兵變成強盜，自己也朝向殖民地而邁進。」（2006：496）言談中充滿「身不由己」的意味，主張日本是在有限的選擇中為自保而向外侵略。當然可以批評這樣的想法也是缺乏獨立性的，是「躲在歐美的陰影裡的詭辯術」（溝口雄三，1999），但這樣的剖白更幫助我們瞭解了日本至今難就戰爭侵略全盤道歉之情感癥結：如果向外侵略是日本因為不能成為西方，以至於必須回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到亞洲才能取得行動身分，完成現代化進程，那麼就戰爭侵略向其他東亞國家道歉，不就否定了東亞做為一體，也就否定了推動整個現代化過程的主體價值？

溝口雄三曾指出：日本右翼傾向採取「受害者」的單面向來記憶戰爭體驗，而淡忘「加害者」的角色，畢竟用受害者的姿態維持控訴的正當性是遠比作為悔過的加害者輕易多了（1999）。此發展與二次大戰之後美國接收日本、保留天皇制而免於戰爭反省的歷史有深刻聯繫，右翼史觀將太平洋戰爭看作是「日本帶領亞洲、對抗西方」的「有色人種對抗西方殖民者」，原爆的屈辱因此不只是日本民族的屈辱，同時也彷彿是日本「為了全亞洲」而概括承受的重創。而由於麥克阿瑟佔領日本後並未對裕仁天皇的戰爭罪責多加處理，甚至在韓戰後積極扶植日本右派、打擊左派，這些政治現實俱卻除了右翼國家主義者反省戰爭真實責任的壓力和需要，也使得其國家觀點在戰後仍隱晦地保存下來（小森陽一，2004）。對於與石原分享著相同意識形態的國家主義者來說，日本在二次大戰中已經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但受害國在日本的快速繁榮中始終沒能得到真正的寬慰，因此「南京大屠殺」之於中國人永遠是一個不斷生產仇恨與憤懣的記憶機器（溝口雄三，Ibid），但此般情感鴻溝卻使得和解之路愈加迢遙。

三、冷戰後的中國威脅論

在 1989 年之前，石原對於中國最主要的批判就是在「反共」陣線上發揮，隨著冷戰瓦解與中國大陸經改開放，「共產世界」與「自由世界」的二分法頓時失去意義。此後，石原慎太郎於是採取不同修辭將中國描述成世界安全與繁榮的威脅者，對內要求日本與中國審慎來往，對外呼籲美國與亞洲諸國共同提防。具體的觀點包括下列幾項：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 批判中共專制統治，預言中國崩潰

1995 年在與馬來西亞總理馬哈地合著的「The Voice of Asia」中，他首先批判北京政府對於天安門學生運動的鎮壓，接著預言市場的開放將為專制政體帶來多重衝擊：不均等的經濟分配將迫使族群意識上升，要求自治；而受到西方資本主義文化洗禮的東南沿海，也將逸出北京的高壓掌控。隨著北京當局的影響力減弱，中國將由集權國家分散為多族共和，並融入日本所領導的大東亞經濟圈中（Ishihara and Mahathir, 1995：142-143）。2002 年 6 月的日美商會上，石原再次預測中國在十幾年後必將分裂成數個小國家。

2. 中國是核武持有國，日本應與美國聯手制衡其侵略擴張。

石原慎太郎曾經多次向國際指控中國軍事擴張，包括 2000 年 8 月接受德國《明鏡週刊》訪問時稱「中國是最大的威脅」；2001 年 9 月訪問美國時，指責中國企圖在亞洲建立「擴張帝國」，支配整個亞洲地區；2005 年 11 月再訪華盛頓，石原在演說中表示「美中若開戰，美國必敗」，因為「戰爭歸根究底即是生命的消耗，但中國沒有尊重生命的價值觀，而有著公民社會的美國則仍仰賴公民決定，因此一但進入消耗戰，必定不敵中國。」因此石原主張美國應該對中國採取經濟封鎖，以遏止其軍事擴張。最後石原尚強調中國可能發動核戰：「美中之間若有紛爭，中國勢必想除掉最礙眼的美日安保體制，到時候中國的核子彈不是落在琉球，就是對準東京吧！[27]」

3. 移民、盜版威脅日本內政與智財權

不僅中國政府是威脅製造者，石原眼中的中國人也象徵著對日本安全福祉的另一類威脅。繼 2000 年的歧視「三國人」言論引起國際關切

[27] 發言皆轉引自中國時報 2005/11/11 報導，「石原：中國可能發動核戰」，另外石原的詳細論證可參見 2005/12/05《產經新聞》文章：「アメリカは勝てまい」（美國必敗）http://www.sensenfukoku.net/mailmagazine/no42.html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後，2003 年 8 月 4 日石原慎太郎又發表文章〈昔遣唐使，今不法入國者〉[28]，譴責非法中國移民形成東京市治安問題，犯下偷盜、非法打工等罪，又盜版日本的文化商品牟利，侵犯日人的智慧財產權；石原因此主張日本政府需要更積極管理的移民政策來抑制非法移民。

四、主權問題與中國正面交鋒

為了凸顯日本在亞洲的地位，石原動輒在主權問題和領土問題上與中國正面衝突，製造緊張。1999 年 4 月當選東京都知事後，石原即在媒體訪問中就西藏人權問題、台海兩岸問題對中國大肆批評，引發中國不悅。1999 年台灣發生九二一大地震後，石原即在 11 月來台訪問，成為 1972 年中日建交後前來台灣訪問層級最高的日本官員，期間石原直言「台灣是一個國家」，引起中共抗議，憤指其「挑釁中國主權」，最後日本內閣只能以「個人行為」向中國致歉。2000 年 3 月李登輝卸任總統職務，石原慎太郎與自民黨議員村上正邦籌組委員會邀請其訪日，再度引起中共關切（陳世昌，2000a）；4 月，達賴喇嘛訪問日本，石原慎太郎也計畫與其座談，再次造成中國大動作施壓（陳世昌，2000b）。2006 年，在產經新聞上發表的〈自由台灣的存在意義〉一文，石原再次批判中國對於台灣與西藏的壓迫，呼籲東亞各國應「共同維護台灣的獨立性，以保障亞洲的安定。

在中日間敏感的主權問題上，石原也頻頻有動作。包括自 1978 年，石原慎太郎與青嵐會成員發起了日本方面的首次「保釣」行動，募集了十幾位大學生到釣魚台島的東南方蓋了一座燈塔；1997 年 5 月亦有類似行動。2005 年 5 月，在中國爆發激烈反日暴動之際，石原與民主黨議員枝野幸男共同要求日本政府派駐自衛隊至釣魚台維護主權（陳世昌 2005），並且在 5 月 25 日帶著國旗駕船登上東京東南方一千多公里，具

[28] 參見石原慎太郎官方網站：http://www.sensenfukoku.net/mailmagazine/no14.html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有戰略價值的「沖之鳥礁」，在島上揮舞國旗、親吻土地[29]。6 月，石原慎太郎在公開談話中繼續向日本政府施壓，鼓吹若中國侵犯釣魚台主權，日本政府應不惜發動一場「國土保衛戰」（人民網，2007）。凡此種種言論都屢屢引起中國的不滿與抗議。

隨著這一連串「中國威脅」論述的發表，連帶還呈現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便是石原對於美國態度的轉變。在石原積極向美國「說不」的時期裡，除了零星向中國表達抗議的舉動之外，石原甚少將中國描繪為區域安全的威脅者；但隨著 1997 之後中國崛起為區域霸主的態勢愈趨明確，石原對美國的態度也由挑釁逐漸修正為強調日美同盟關係、要求共同防堵中國崛起的基調。石原對美態度的轉變並非特例，事實上，他的轉向還反映了日本知識界面對新國際局勢的不知所措[30]：雖然冷戰結束讓原就不對等的日美同盟關係更加值得質疑，但隨著中日韓間的歷史傷口重新掀開，而中國崛起和國內泡沫經濟又形成鮮明對照，危機意識驟升的日本不能不繼續追隨美國，外交的迴旋空間因而受到壓縮。就地緣政治來說，日本離不開東亞，因而必須設法和中國維持良好關係；但歷史仇恨尚未化解，新的競爭關係則已展開，於是除了以「中國威脅論」來投射對中國的敵意想像外，也只好繼續依附美國，甚至寄望日美同盟能夠與崛起中的中國抗衡。

[29] 可參見 2005/06/06 發表於產經新聞的評論「沖ノ鳥島の戦略的意味」http://www.sensenfukoku.net/mailmagazine/no36.html，石原在文中詳細說明了沖之鳥礁之於日本的戰略意義，呼籲日本政府拿出魄力捍衛主權，防止中國在西太平洋擴張軍力。

[30] 早在 1992 年，Kishore Mahbuban 便以「漂浮外交」形容日本浮盪在中美之間的兩難之境（“Japan A Drift”, Foreign Policy 88: 126-144）；另外關於日本因為擔心東亞權力平衡發生變動而希望加強日美同盟關係的剖析，可參見 Yoichi Funabashi. 1998. “Tokyo’s Depression Diplomacy.” *Foreign Affairs* 77(6)： 26-36.以及 Wu Xinbo. 2000. “The Security Dimension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 Warily Watching One Another.” *Asian Survey* 40(2): 30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五、親台北、遠北京的城市外交

1999 年石原慎太郎當選東京都知事後，即在訪談中透露親台北遠北京的政治立場，不但透露「我與李登輝總統是好朋友，必要的話我會考慮訪問台北」，同時表示「中國大陸對人權和西藏問題的立場，讓我不喜歡目前的『中國』當局。東京與北京的都市交流不需要中止，但如果一定要派人參加，我將會指派副知事前往。（陳世昌，1999）」而他也說到做到，在當年 11 月便訪問了台灣慰問 921 大地震災情，但同一年東京北京姊妹市締交的 20 週年慶，卻僅派副知事前往致意。總計從 1999 年上任東京都知事迄今，石原慎太郎至少前來台灣五次之多，但卻從未訪問北京，引起北京市市長在 2005 年訪問日本時抱怨：「他既不來北京，也不招待我訪問東京，損害日中之間地方的友好基礎。」（中國評論新聞網 2005）

2000 年，石原慎太郎與三個亞洲城市共同發起了「亞洲主要都市網」，促進亞太地區主要城市之間的交流，這可以視為延續石原建構亞洲以面對美國的努力，因此即使石原不屑與中國往來，仍認識到北京的參與不可或缺。但 2004 年年會時台北與北京爭奪 2005 年主辦權，實則在石原的籌謀之下，造成北京不滿協議結果，拒絕簽署共同聲明「雅加達宣言」，於是退出主辦。北京退出後，石原積極協調台北提前主辦，於是台北將原訂於 2006 年秋天舉辦的第六屆年會提前至該年 4 月舉行，會員國於是在台北開了一場沒有北京的亞洲城市大會。石原對於北京的缺席僅表示「非常遺憾」，中國媒體則直指北京的缺席是石原基於親台立場的「陰謀」（泉州網，200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伍、代結論：石原慎太郎的歐亞迷航

王屏在《近代日本的亞細亞主義》中曾指出：「近代日本人的國際觀是在『東洋對西洋、文明對野蠻』的框架內形成的。在按道德畫線時，日本把自己劃歸為東洋。在按文明畫線時，日本又把自己劃歸為西洋。」（2004：217）總結石原慎太郎的發言，這樣的困惑依然存在。儘管石原慎太郎對美國與中國都有所批判，但兩者作為日本國家的「威脅」，意義迥然不同：石原口中的美國是一個蠻橫的壓迫者，以偽善的世界警察姿態四處干涉，而日本明明有能力與之平起平坐，卻又因膚色之故受盡歧視，因此必得加以譴責，並且以亞洲特有的文明價值來聲稱日本比美國更優越，從而與之競逐普遍霸權姿態。相對的，中國則是一個落後的、反人權的、不遵守文明世界遊戲規則的麻煩製造者，同時又是亞洲安全的威脅者，因此日本不時以文明承載者的姿態對中國指指點點，甚至提醒軍事同盟的美國一起防範中國。石原想帶著亞洲對抗西方，是複製戰前日本由「脫亞」而「興亞」的圖式，遮掩其不被美國平等接納的狀態；但當中國經濟超越日本的預言蔓延，甚而與日本競逐區域霸主，石原又必須拉著日美同盟的力量來箝制中國，從而強調其比中國更優越、更符應現代性的文明身份。

然而恰恰是在石原對於中國的抗拒中，透露出戰後日本國家論述依違在歐亞之間，無家可歸的困窘。從戰前的帝國主義岐路到戰後的經濟大國路線，日本的國家主義是追隨著西方文明的普世價值而亦步亦趨發展起來；設若經歷共產革命、並且不願接受民主體制的中國能夠被世界所接納，等於否定日本過去以「文明化」為唯一標準的發展軌跡，也否定以亞洲一體爭取與西方平等的願望。這樣的兩難之境無巧不巧地揭露了石原愛國論述的罩門：由於石原選擇以現代化、文明化的程度來填充日本的主體內涵，這使他的國家主義論述失去了任何西方意識形態加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挑戰的效力，而只能緊追著美國的腳步和美國所設置的標準，來界定日本的策略。正如酒井直樹（Naoki Sakai, 1997：157）在分析戰後日本發展經驗時所指出的，特殊主義和普遍主義之間存在著互為表裡、相互形塑證成的關係，戰後日本對於現代性的追求，其實是以日本的「美國化」為目標，因此既已無力對日本的發展模式提出反省，那麼即便選擇了以特殊化的日本民族主義形式來批判美國，最終卻只是再次確認美國價值的優越性，也強化了日本的無力感。

不同於戰前脫亞論者的是，一百年前的中國是隨時可能瓦解的弱者，石原所面對的中國卻是一個令戰後日本知識界滿懷愧疚的對象，也是一個早已走出自己「特色」的新中國，以致將其收編入大東亞共榮圈的可能性已不存，只好將其描繪為野蠻的流氓國家，或是隨時可能崩潰的脆弱政體。因此石原的「中國威脅論」與「中國崩潰期待論」為追求日本現代大國身分的一體兩面，一面警告著中國具有的潛在威脅，一面卻又預言著中國現存不合理體制的必然崩解。如同戰前思想家面對中國時的往返思辨一般，石原時而以「亞洲第一」的想像對抗西方，時而又在西方的陰影下檢舉中國的不合規範；離開亞洲，日本似乎不值得西方尊重，但建構亞洲，日本又似乎無法處理獨自崛起的中國。面對著難以定位的中國，日本在歐亞之間的漂流依然迷航。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參考文獻

（一）中文專書

Nathan, John, (1987)，《夢幻武士—三島由紀夫傳》，梁翠凌譯，台北：社會大學出版社。

（2005），《無約束的日本》，周小進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小森陽一，（2004），《天皇的玉音放送》，陳多友譯，上海：三聯。

王屏，（2004），《近代日本的亞細亞主義》，北京商務印書館。

石原慎太郎，（1987），《斯巴達教育》，蘇錫淇譯，台北：水牛出版社。

（1990），《可以說 No 的日本》，與盛田昭夫合著，劉秀琴等譯，台北：中央日報出版社。

（1992），《日本堅決說不－戰後美日關係總結》，與江藤淳合著，北京軍事科學院譯&出版。

（2004），《太陽的季節》，蔡姿淳譯，新店：尖端出版。

（2006），《國家的幻影》，劉崇稜譯，台北：商務。

孫政，（2005），《戰後日本新國家主義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卓南生，（2006），《卓南生日本時論文集－日本社會》，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謝志宇，（2005），《20 世紀日本文學史－以小說為中心》，浙江大學出版社。

（二）中文論文

山室信一，（2004），〈面向未來的回憶－他者認識和創建的視角〉，《中國與日本的他者認識：中日學者的共同探討》，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石之瑜，曾倚萃，李圭之，（2007），〈日本近代中國學：知識可否解放身份〉，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刊 163 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吉見俊哉（Yoshimi Shunya），（2002），〈欲望／忘卻「美國」的日本戰後——「基地」與「消費文化」的錯綜關係〉，李文茹譯，《中外文學》31 卷第 7 期，2002 年 12 月。

查道炯，（2003），〈「正常國家」與冷戰後日本對華政策的研究〉，香港社會科學學報 25 期，pp.1-29

溝口雄三，（1999），〈創造日中間的共同知識空間〉，趙京華譯，http://www.frchina.net/data/personArticle.php?id=2959

（三）日文論文

Ishihara, Shintaro, (2003)，『昔遣唐使，今不法入國者』，http://www.sensenfukoku.net/mailmagazine/no14.html

(2005)，『沖ノ鳥島の戦略的意味』http://www.sensenfukoku.net/mailmagazine/no36.html

2006，『自由台湾の存在意義』http://www.sensenfukoku.net/mailmagazine/no21.html

（四）英文專書及論文

Asada, Akira, 2000, “A Left Within the Place of Nothingsness”, *New Left Review* Sep-Oct 2000.

Dower, John, 1993a, “Japan In War & Peace: Selected Essays”, The New York Press

1993b, “Peace and Democracy in Two Systems: External Policy and Internal Conflict” in Gordon, Andrtew (ed.) 1993, Postwar Japan As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Ishihara, Shintaro. 1989, “A Japan That Can Say No: why Japan will be first among equals”, NY Simon & Schuster

1995, with Mahathir Mohamad, “The Voice of Asi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Nathan, John, 2001 “Tokyo Story: A Profile of Shintaro Ishihara.” *The New Yorker,* April. 9 2001.

Sherif, Ann, 2005 “The Aesthetics of Speed and the illogicality of Politics: Ishihara Shintaro’s Literary Debut.” Japan Forum Vol 17 No.2, pp.185-211.

Singh, Bhubindar, 2002, “ASEAN’s Perception of Japan: Change and Continuity”, Asian Survey, Vol.42, No.2, pp.276-296

Sakai, Naoki, 1997, “Translation and Subjectivity:On ‘Japan’ and Cultural Nationalism”,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Yasutomo, Dennis T, 1989, “Why Aid? Japan as an ‘Aid Great Power”, *Pacific Affairs,* Vol.62, No.4.pp.490-503

（五）中文報導

人民網（2007），〈日本頭號反華份子—石原慎太郎〉，1 月 12 日。http://big5.china.com.cn/international/txt/2007-01/12/content_7644506.htm。

中國評論新聞網（2005），〈王岐山晤日本三縣知事譴責石原慎太郎〉，11 月 4 日。

田思宜（2001），〈東京公立殘障學校採用新歷史教科書大江健三郎痛批〉，8 月 9 日，聯合報 5 版。

陳世昌（1990），〈接受『花花公子』訪問日本下屆首相人選石原慎太郎：『南京大屠殺，中國人編造的』〉，9 月 8 日，聯合報，6 版。

（1999），〈石原親台北遠北京〉，4 月 15 日，聯合報 13 版。

（2000a），〈日議員將籌組委員會邀訪李總統北京重申堅決反對立場〉，3 月 8 日，聯合報 A14 版。

（2000b），〈北京與日本外務省強大壓力下達賴抵日訪問不與石原會面〉，4 月 14 日，聯合報 A14 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005），〈反中升溫石原慎太郎力促釣魚台駐軍〉，5 月 3 日，聯合報 A14 版。

泉州網（2005），〈抗議台爭主辦權北京退出亞洲主要都市網〉，9 月 3 日，http://www.qzwb.com/gb/content/2005-09/03/content_1785421.htm。

黃菁菁（2007），〈石原新片引爭議神風特攻隊英勇赴死？美麗誤解〉，3 月 1 日，中國時報 14 版。

新華社（2005），〈石原慎太郎登沖之鳥礁〉，5 月 25 日，http://news.sina.com.cn/w/2005-05-25/12226744932.shtm。

董更生（2001），「日右派與反戰示威者，大打出手」，8 月 16 日，聯合報 11 版。

聯合報（1973a），〈日自民黨年輕議員以組成青嵐會歃血為盟誓與共黨作戰〉，7 月 19 日，四版。

（1973b），〈日本『青嵐會』會員採取明確反共行動〉，7 月 21 日，四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Displaced in Modernity: The Question of Ishihara Shintaro

Ya-Han Chuang

Abstract

Widely known for his nationalistic view of Japan's international status, Ishihara Shintaro is commonly considered the most eminent character among Japan's right wing politicians. This article reviews his comments on Japan's history and foreign relation and examines his deeper motivation to resist US and China so as to ensure Japan's status as a modern, civilized nation-state. In doing so, the linkage between Ishihara's ideology and that of the Japanese intellectuals before World War Two is unveiled: both try to depreciate China while enabling Japan to challenge the West as Asia's leader. However, contemporary China's rise makes it impossible to disdain China as Ishihara's predecessors have done, and thus his critique is trapped in a different dilemma.

Keywords: Asia, Asianism, China, Cold War, Ishihara Shintaro, Japan, Normal Stat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